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4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4 2008
(第7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7)

现代农业发展中的财政农业投资模式创新

熊启泉, 邓家琼

(华南农业大学 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业功能中经济功能的权重不断降低,而非经济功能的权重快速上升。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以提高农业综合价值为目标,树立现代农业价值观,从投资主体、投资机制和投资结构等方面重塑财政农业投资模式,促进非经济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 现代农业; 农业价值观; 财政农业投资模式

中图分类号: F3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8)04-0049-07

一、日益重视农业非经济功能的现代农业价值观

农业为人类发展提供食物、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原料和积累资金等功能,一般可通过市场交易得到价值补偿,所以这些功能又被称为农业的经济功能,或农业的经济价值(农业的市场价值)。除了经济功能,农业还具有改善与恢复生态环境、传承农耕文化、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非经济功能。这些功能是农业生产过程的副产品①。由于农业生产中的外部经济效应难以通过市场交换得到价值补偿,因此,农业的非经济功能,相当于农业的非经济价值(农业的非市场价值)。

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较大,为了实现GDP和人均GDP的增长,人们对农业经济价值的评价赋予了较高的权重,而对农业非经济价值的评价赋予的权重较低。在工业化中期和后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已大幅度降低,农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经济价值在农业价值评价中的权重下降,而农业非经济价值在农业价值评价中的权重急剧上升。

人们对农业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评价权重的变化,意味着农业价值观日益重视农业非经济功能的倾向。在传统农业阶段,人们更多的是从农业提供农副产品的角度,即农业生产功能的角度,侧重评价农业的经济价值。在现代农业阶段,农业经济价值依然是重要的,但农业非经济价值有超越经济价值的趋势。"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最终将催生一种"农业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并重,由非经济价值主导"的综合的现代农业价值观。

在现代农业价值观背景下,在强调农业产品生产功能的同时,也需要特别注重产品质量的改进,即提供符合人类健康需求的绿色农产品。当然,现代农业更强调非市场价值,农业生产应是环境友好型的生产,通过农业生产发挥其改善环境、保全国土、促进社会和谐和传承农耕文明的功能。

二、用公共财政塑造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

农业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农业投资模式。现代农业的公共品属性要求用公共财政

收稿日期:2008-07-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06JA790039);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DXM79003)

作者简介:熊启泉(1966—),男,四川阆中人,华南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

① 严格说来,农业非经济功能是农业生产过程的正外部性,只有合理耕作的农业,才有非经济功能。

支持现代农业的发展。其作用途径是:用财政农业投资塑造现代农业投资模式,用现代农业投资模式支持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一)现代农业的公共品属性

现代农业价值观取代传统农业价值观意味着:现代农业不仅要提供农产品,而且也是一个"生命的空间",现代农业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即经济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生活价值的和谐实现[1,2]。由于人民对农业非经济价值的评价超越了对农业经济价值的评价,而农业非经济价值主要体现为农业的积极外部性和公共品属性,这就决定了现代农业是一个具有较强的公共品属性因而也很容易出现市场失灵的产业。

现代农业的公共品属性决定了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公共财政的支持。财政性农业投资的基本作用是改善和优化农业发展所必须的公共品供给,塑造农业投资模式,引导民间资本投向现代农业发展,进而达到与矫正市场失灵的目的。

当然,不同的农业发展项目具有不同的消费需求特性,其外部性和公共性有很大的差异。"公共"程度越高、受益地域范围越广的现代农业发展项目越应由上级财政支持,或由受益范围内的地方政府联合提供。

(二)财政性农业投资对现代农业发展的作用

财政性农业投资是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对农业的净流入,在带动其他农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在优化农业投资结构、在塑造农业投资和农业发展模式方面发挥着其他农业投资主体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财政性农业投资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1. 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通过投资农业发展所需的农村公共品环境、支持农业科研,财政性农业支出可以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提高农业投资的产出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从而在农业资源总量基本保持不变甚至在减少的情况下推动农业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大大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2. 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

通过资助农业科研,财政性农业投资可以改善农产品的品质,加快农产品品种更新换代的步伐;通过补贴农村教育,引导和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从而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总之,财政性农业投资是提高包括质量竞争力、价格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在内的农产品的整体竞争力的重要基础。

3. 塑造农业投资模式和农业发展模式

财政性农业投资可以改善农业投资环境,为集体、农户和农业企业增加农业投入创造条件,可以引导其他农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资,从而起到增加农业投入总量的乘数作用。同时,财政农业投资具有导向作用,引导其他农业投资主体投资,优化农业投资结构。因此,财政性农业投资模式实际上决定着农业投资模式,进而决定着农业发展模式。

4. 降低农业系统风险,增加农民收入

通过资助农村水利灌溉设施、农村交通网络、农村信息网络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农村公共品建设,财政性农业投资可以大大降低农产品的交易成本,拓展农产品的市场半径,降低农业系统面临的风险,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三、目前的财政农业投资模式不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

以"农业增长高出人口增长1个百分点,农业发展就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的国际经验看,近年来我国农业发展似乎没有问题[3]。然而,如果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发展现代农业、从应对农业国际竞争、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看,我国农业发展正面临着潜在的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财政性农业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性农业投资总量不足

1. 财政农业投资规模与国民经济中的农业份额和农业增长不相称

1990— 2007 年,我国 GDP 增长一直高于 7%,年均增长 10. 28%。相比之下,农业增加值均在 5%以下,年均增长 3. 90%。2007 年农业增加值占我国 GDP 的比重虽已降到 11. 72%,但农业劳动力仍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 43%,农业劳动力仍然高达 3. 26 亿人。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根据世界农业投资增长规律,农业总投资的增长速度一般要高于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财政性农业投资的增长速度一般高于农业总投资的增长速度。然而,1978—2006 年,按绝对价格计算的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年均增长速度 11. 50%,低于农业增加值年均 12. 03%的增长速度 0. 53 个百分点;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财政农业支出年均增长率 5. 49%,仅略高于 4. 61%的农业真实增长率。考虑到财政性农业投资极强的外溢效应,中国财政农业投资增长与农业增长中农业投资加速增长的一般规律存在着很大差距。

比较国民经济中农业所占份额与农业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1980—2006 年间,除 1980 年、1991 年、1992 年和 1998 四个年份外,其余年份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比重均低于 10%,平均仅为 8. 49%,大大低于同期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19. 42%。我国人均 GDP 已超过 2000 美元,已迈入工业化的中后期,根据世界农业投资的一般规律,农业比较投资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应接近于 1。然而,2006 年我国农业比较投资率(以农业比较财政投入率[①]来代替)仍然只有 0. 67。这反映出我国对农业的投资仍然不足。

2. 财政农业投资规模不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现代化农业中的高农业生产率,是建立在现代化的投入要素和现代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从农业生产率看,我国目前主要农产品土地生产率除大豆外均不同程度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若与世界单产最高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若从农业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无疑是世界上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现代农业要求有会经营懂管理的现代农民。然而,到 2006 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中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业劳动力仍占全部农业劳动力的 6. 65%,小学文化程度占 26. 37%,初中文化程度占 52. 81%,而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业劳动力仅占 14. 17%,其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 2. 65%。农业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远远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发展农村教育,加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单纯由农民自己进行教育投资,显然会出现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小学辍学人数明显增加,升学率提高缓慢,初中到高中的升学率明显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投资不足有关。

3. 财政农业投资难以满足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农业竞争力的需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市场取向的改革推动下,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在供给总量不足和农业开放度非常低的情况下轻易推进。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农产品供给从总量不足转为总量大致平衡和结构性过剩,农业发展总体上已进入必须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新阶段。跨入 21 世纪后,进一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业竞争力成为我国农业成功应对国际化竞争的关键。近两年,伴随着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出现,我国农业又进入了供给的紧平衡阶段。从农业发展史看,农业技术创新是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业竞争力提升的基础。目前,我国结构调整的技术支撑不足,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缓慢,在很大程度与财政对农业科研投资极其低下有关。

---

① 农业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之比。

4. 财政性农业投资未能充分利用 WTO《农业协议》提供的支持空间

WTO《农业协议》虽然对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方式和程度进行了约束和规范,但它仍然为财政支持农业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如不受约束的"绿箱"支持措施。根据 WTO 对农业财政性投资的规定和发展趋势,我国目前在宏观层面上对农业的保护与支持既存在总量不足又有结构失衡的问题。1996—1998 年,我国农业的国内支持总量(AMS)年平均为 1063.24 亿元,仅占农业生产总值的 4.51%,其中,"绿箱"政策支持年平均为 772.98 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3.28%。"黄箱政策"支持在 1997—1998 年平均为 290.26 亿元,相当于农业总产值的 1.23%。我国对农业国内支持的力度是很不够的。目前我国虽已取消了农业税,公共财政也增大农业投资力度,但财政支持农业仍有很大空间。

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不足的直接结果是农村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表现为:(1) 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导致了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差,水灾旱灾不断发生,使农业仍然面临很高的自然风险;(2) 农业发展亟需的道路、通讯、运输、仓储等基础设施落后,农产品市场半径小,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体系还远未形成,使农业仍然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3) 农业仍以传统耕作方式为主,基础性科学研究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推广体系还很不健全,科技进步对农业产出的贡献率仅 40% 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 70% -80%;(4) 农产品价格竞争力、质量竞争力和物流体系竞争力低下,不能适应农业国际化的需要;(5) 农村电网、饮水、电视、通信、广播、市场基础设施等的供给不足严重影响了我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6) 财政性农业投资不足加剧了金融资本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从农村系统的退出,使农村资本短缺的现象更加严重。

(二)财政农业投资的结构错位与低效率

财政农业投入总量不足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还表现在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明显错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效率。财政农业投入结构错位集中表现在:

1. 对农产品流通经营领域投入过多,对生产经营领域投入过少

近 20 年来,为了国内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为生产者提供相对平稳的价格信息,政府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补贴粮食流通经营领域。然而,我国国有粮食企业的经营体制使得政府无法有效区分粮食企业的亏损究竟是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性亏损,以致国有粮食企业将经营性亏损也说成是政策性亏损,骗取国家财政补贴,从而大大降低了财政农业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1998—2002 年,国家用于粮、油、棉流通环节的补贴平均每年高达 591 亿元,占国内支持总量的 30% 以上。从长期来看,这种大规模的补贴不仅无助于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农民从中直接受益甚微①,真正的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和国有粮食企业,补贴的效率低下。

2. 对农业生产经营领域的投资存在着公共投资"挤出"私人投资的现象

财政性农业投资的目的主要是矫正农业领域容易出现的市场失灵,提供构成农业发展环境所须的公共品环境。然而,我国长期以来使用农业投入补贴政策,补贴政策初衷是引导农业结构的调整,但由于相关体制不完善,补贴真正流入农民手中的微乎其微,倒是培养了一批影响农产品流通经营体制改革的利益集团。即使流入农民手中的补贴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投资。

3. 对农业支持与 WTO《农业协议》的要求存在着诸多不一致的地方

WTO《农业协议》对"绿箱政策"没有进行任何限制,将来也不会要求做削减承诺。从长期来看,"绿箱"政策措施将是财政农业投资的基本领域,也是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竞争力所必须的。然

① 在粮食补贴方面,国家每花费 7 元钱,农民才能得到 1 元[4]。

而我国对“绿箱”政策措施所允许的 12 项政策只使用了 6 项；另一方面，容易带来很多政治经济问题的“黄箱”政策补贴占我国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却达到 3.3%，花费了较多的财政资金[3]。

4. 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

一方面，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紧密相关的农村公共品①供给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财政对农业投资存在许多方向性的偏差。不是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或者不是农民所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公共品”供给过剩，如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和达标工程。事实证明这些农业财政投资大多是效率极低的，对农业发展和解决当前的农村问题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却浪费了大量宝贵的财政资金。

四、财政农业投资总量不足与结构偏差的原因解析

财政性农业投资不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财政资金的约束。我国财政收支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90—2006 年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7.50% 和 17.45%，而同期我国财政农业支出年均增长率仅为 15.70%，比国家财政总支出增长率低 2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整体上已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已经具备了反哺农业的条件，但财政性农业投资一直增幅不大，有限的农业财政资金又存在着使用的低效率问题。财政性农业投资体制的缺陷是导致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不足、投资结构错位和使用低效率的主要原因。

（一）事权不清导致农业财政投资主体模糊

1994 年我国实施新的财税体制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并且依据事权的大小划分财政权限，即事权与财权相称。中央政府主要承担国防、外交、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等全国性公共事务，地方政府则负责本地的行政管理、公共安全、基本建设、文化、教育、卫生等地方性公共事务。这只是一种原则性的划分，事实上各级政府在农业投资上的事权是模糊不清的。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保、食品安全等外部性很强、公共程度很高的公共品供给，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很难界定清楚。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链条中对农业领域投资事权的界定就更加模糊不清了。虽然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所提供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确定各级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但由于农业投资效益长期性的低激励，以及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之间在财政农业投资方面客观上存在的非合作博弈关系，农业的财政投资就很容易出现严重不足。

（二）基层财政资源短缺导致农业财政性投资的总量不足

县乡财政的困境在我国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1999 年，在全国 45000 个乡级财政中，需要上级补助的乡镇占 52%；2000 年，在全国 2074 个县级财政中，有 950 个县属于财政补助县，占 46%。这些财政困难的县乡往往是农业县，地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农业税收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财政困难—对农业财政投资不足—农业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业发展缓慢—财政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减少—财政困难。如果再算上县乡庞大臃肿的行政机构和数额巨大的负债问题，许多县乡财政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一个为吃饭而发愁的政府根本谈不上对农业进行投资，县乡农村经济发展严重欠账。2000 年乡镇经常性支出和建设性支出分别占全国乡级财政支出的 89% 和 11%，而这仅有的 11% 建设性支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发达省份。

（三）农村公共品需求表达机制的内在缺陷

公共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条件是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之和等于公共品生产的边际转换

① 包括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农村水利设施、农村市场设施、农村信息与科技服务网络、农村义务教育、农村环境保护。

率。由于公共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消费者的偏好不能通过货币投票即价格来显示,因此经济学家找到另外一种投票机制——民主机制。虽然这种偏好显示的方法存在许多缺陷,如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投票协商过程较高的交易成本、农民所面临的各种约束,但它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对公共产品进行偏好显示的方法,尤其是地方性公共产品。

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滞后使得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很好的行使,导致农民对财政性农业投资没有创制权。事实上,在我国现阶段的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下,财政性农业投资的创制权在政府部门。因此,就产生了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农业财政性投资往往不是用在农业最需要的地方,公共产品的利用率低,投资效率也低。

(四)缺乏科学的农业财政投资的决策与监督机制

农业财政投资在我国缺乏一套科学的决策与监督机制,因而投资效率普遍不高。在实行分税制后,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并不对称,往往出现"收入上移、支出下移"的情况。投资决策往往集中在上级政府部门并要求下级政府配套各项资金。由于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县乡有限的财政资金就被投入到一些效率低下、社会效益不好的项目上。另外,由于基层民主政治的不完善,农民不能很好行使民主权利,对农业财政投资的监督不到位,这反过来又增加了财政性农业投资决策的随意性。

(五)财政性农业投资总量不足导致财政性农业投资效率低下

1994—2006 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平均占 65%,而在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中,事业费部分又占 65%,真正用于支援农业生产支出的财政资金仅占 35%。由于用于事业费支出部分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因此,财政农业支出的波动将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支援农村生产支出的波动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波动,最终反映为农业和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波动。在满足农林水气象等部门事业费的刚性需求下,财政性农业投资总量增加,财政性农业投资效率上升。

五、我国财政农业投资模式创新的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农业已处于一个开放度不断提高、竞争更为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财政性农业投资必须遵守 WTO 关于农业生产与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规则。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国际竞争力,如何降低农业系统面临的风险和增加农民收入,如何优化财政性农业投资结构和提高财政性农业投资的使用效率,成为重塑我国财政性农业投资模式的基本出发点。

(一)建立农民对农村基础设施需求的充分表达机制

只有农村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农民才知道自己最需要的公共产品,因而他们的需求应该能得到充分表达。通过推进"管理民主"来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让政府知道什么公共产品能产生最大的社会福利,这样才能保证农业财政投资的有效性和实现效率的目的。

(二)充分利用 WTO 规则,加大财政农业投资力度

财政农业投资必须站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高度,以降低农业面临的系统风险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加大财政农业投资的力度,优化财政农业投资结构,提高财政农业投资的使用效率。具体来说,逐步削减"黄箱"政策投入和粮棉油的价格补贴投入,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农村教育投入,加大农业信息服务、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等支持体系建设的投入,逐步将财政农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与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相等的水平。

(三)创新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投资中的职责

改革现有的财政尤其是县乡财政体制,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凡上级政府规定或要求

进行的投资，资金应由其配套；凡乡镇范围的投资，由乡镇人大决定，乡镇政府进行投资。除了已经实施的财政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外，中央政府还应在农业科研与推广、全国统一的农产品市场建设、信息的发布、劳动力市场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地方政府的农业财政投资则应集中于农业基础设施、与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相关的公共产品等领域。考虑到我国县乡财政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负债严重等困难，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统筹各地的财力分配，以实现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要完善农业财政投资的决策机制，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做到财政资金使用的硬约束。

(四)优化投资结构，充分发挥财政农业投资的乘数效应

财政农业投资在引导其他农业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资进而增加农业投资总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乘数效应。在财政农业投资的使用上，应根据乘数效应的大小，确立投资优先序。注重瓶颈性投资和互补性资产投资，财政对农业科研及推广、农产品物流体系、农村义务教育等领域的投资，能较好的改善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的环境，促使其他投资主体，如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而实现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促进农业发展。

(五)基于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发挥财政农业投资的导向作用

要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农业发展必须实施比较优势战略。为此，必须充分分析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及其变化，确立农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与重点，进而发挥财政性农业投资的导向作用，实现农业投资模式与发展模式的优化。

参考文献：

[1] [日]祖田修. 农学原论(中译本)[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范小建. 加入 WTO 以后的中国农业政策调整[M].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3] 林毅夫. 有关当前农村政策的几点意见[J]. 农业经济问题，2003，(6).
[4] 刘　亮. 调整农业财政政策，增加农民收入[J]. 农业经济问题，2004，(5).

Fiscal Investment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XIONG Qi-quan, DENG Jia-qiong
(*Guangdong Center for Rural Economic Studi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brings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value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economic value is subject to market laws, accompanied with high market volatility;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non-economic values is embodied as the positive externalitie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 market-allocated resources to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f non-economic values is always insufficient. With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value as a percentage of agricultural comprehensive value is decreasing, while the non-economic value's share is experiencing a rapid growth. To develop modern agricultu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hould establish a sound philosophy about the value of agriculture, set up the goal of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value, thus optimizing the regime of fisc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from investment entities, investment mechanism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Key Words: modern agriculture; philosophy of agricultural value; fiscal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